



《大公报》 与现代中国

1926——1949 年大事记实录

重庆出版社

《大公报》与现代中国

1926——1949 年大事记实录

主编 方蒙

编辑 谢国明 孔晓宁

沈兴耕 陶世安

重庆出版社

(川) 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杨亚平
封面设计 彭 广
技术设计 忠 凤

方 蒙 主编
《大公报》与现代中国
——1926—1949大事记实录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5 插页2 字数520千
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
ISBN 7-5366-2330-5/G·821

定价: 10.95元

前 言

方 蒙

《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张历史悠久、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它反映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社会诸多方面的情况，对世界风云的变化、国际斗争的激荡也有较为充分的反映。它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也是中国近-现代史和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

《大公报》于1902年创办于天津。创办人英敛之是满族正红旗人，为天主教徒。他因感于朝廷腐败、外患严重而拥护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为免遭株连，他远走上海、云南谋生。1901年回到天津，恰逢天主教徒、经营建筑与工商业的资本家柴天宠集资逾万元筹办报纸。柴请英主持，他欣然同意。经短期准备，英自任总理、撰述、编辑，统揽言论、经营大权，另请方守六为主笔，于1902年6月17日创刊。

英敛之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创办《大公报》时，在日记中录他人之诗以明志：“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大公报》创刊之秋，他放言要慈禧撤帘归政，并反对袁世凯，使该报以敢言闻名。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10年，清王朝被推翻，民国成立。

FJG/04

他再无意办报，于1912年9月盘售给王郅隆，居香山办慈幼事业。1926年1月10日病逝，终年60岁。这是《大公报》第一个时期。

王郅隆接办后，自任总董，聘胡政之为经理兼总编辑。王是北洋军阀的安福系主将。他将《大公报》办成替安福系说话的报纸，为党派私利服务，受读者厌弃，销数下跌。王于1923年赴日本，死于关东大地震。后《大公报》跌至每日仅印数百份，办不下去了，于1925年11月27日停刊。这是《大公报》第二个时期。

《大公报》第三个时期开始于1926年9月。当时，原在《大公报》的胡政之因报纸停刊，想东山再起。适时，与胡合作办国闻通讯社的吴鼎昌也有办报打算。另一人张季鸾，因所任总编辑的《中华新报》停刊，愿继续办报。三人相遇于天津，共同办报的愿望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吴鼎昌当时任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筹资50 000元作为经费，组成新记公司，从王郅隆家属手中买下《大公报》，重新续刊。

吴、胡、张三人主持新记《大公报》，回顾以往办报教训，认为报纸为一党一派私利服务，或接受某方津贴，受人控制，都是办不好的。吴鼎昌有现职，由胡、张两人专职办报，不兼社外职务，每人月薪300元，不拿外面的钱。吴鼎昌于1935年底去南京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即登报辞去社长职务，不再过问报社事务。后来继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于抗战期间曾谢绝陈诚以高薪聘他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处长职务，以后又两度谢绝以2000元高津贴兼任政治部设计委员职务。

1926年9月1日，第三个时期的《大公报》在天津续刊。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

经理。这一时期的《大公报》经历了新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十年内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6月上海解放，《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宣布为新中国服务为止，历时24年。这一时期是国际、国内斗争最为尖锐、复杂的时期，也是《大公报》影响最大的时期。本书即将这一时期的报纸内容，按年、月、日编排、摘录，并提供背景材料和报社内部情况，编辑成书，呈献于读者面前。因而本书可视为《大公报》的一部缩影。

《大公报》以言论见长。撰写言论者，早期有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等，由张季鸾总其成。以后，经常撰写社论者有王芸生、李纯青、徐铸成等，由王芸生总其成。徐铸成是进步新闻工作者；李纯青是中共地下党员、政论家，台湾问题、日本问题专家。他们所写的言论，观点不尽相同，但影响皆甚大。

《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文有着广泛影响。当时国内一流名人、学者撰文者甚多，如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傅斯年；如张奚若、黄炎培、蒋百里、陈衡哲；如费孝通、潘光旦、曾昭伦、竺可桢、叶恭綽；如郭沫若、茅盾、老舍、沈从文、吴世昌；如李独尘、范旭东，等等。他们就政治、经济、外交、文教、学术等方面发表论述，各抒所见。

《大公报》以新闻专电、特写通讯见长。著名记者云集，活动在国内外新闻热点上，如曹谷冰在苏联采访；萧乾、马廷栋、黎秀石在英国、欧洲采访；杨刚、朱启平在美国采访等。在国内各地采访的有范长江、孟秋江、溪映、陆诒、杨纪、徐盈、子冈、高集等等。社外人士撰写通讯的有戈公振、陈学昭、谢冰霭、胡兰畦、刘尊棋等。还有用绘画作写生通讯的赵望云、沈逸千等。

以上内容，均辑录在本书内，并以社评为重点，摘其要

点。对文章、通讯，或摘其要点，或列其题目；对消息、专电，则录其版面标题。为了存真，尽量保持了原貌。这样，《大公报》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工农的态度也如实地记载下来。这既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大公报》历史的组成部分，读者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海内外毁誉不一。1941年5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授予它新闻荣誉奖章；联合国推选为全世界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报纸之一，陈列在联合国总部图书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重庆《新华日报》、香港《华商报》曾就某一报道致函或著文对它进行批评；国民党对它警告，罚停刊数次，逮捕记者及编辑部主任，驱逐重庆馆经理王文彬；国民党《中央日报》曾连续发表社论，点名三查总编辑王芸生，等等。本书对这些事件均按当时情况加以实录。

长期以来，对于《大公报》的批评主要有二：一是认为它是国民党党政学系机关报；二是认为它对国民党当局小骂大帮忙，以小骂达到大帮忙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60年代，在当时政治气氛下，当年的总编辑王芸生和总经理曹谷冰曾合写回忆录，对《大公报》和他们本人进行自我讨伐。^①80年代，李纯青、夏晓林、谢国明等人先后发表文章，认为它不是政学系机关报，对国民党不仅是小骂，也有大骂，而且大骂、小骂都是真骂。^②因本书的时间下限定在1949年6月，故这些文章均未收入。

①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载《文史资料》第25、26、27、28辑。

② 李纯青：《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夏晓林：《坚持抗战，功在国家——张季鸾在抗战期间的大公报社评》，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谢国明：《论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载《新闻研究资料》第3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公报》原在天津出版。后因日军南侵，曾先后迁移上海、汉口、香港、重庆、桂林等地出版。有时，同一时期在几个城市同时出版。香港、重庆、桂林还出版过晚刊。香港版《大公报》仍在继续出版。内地《大公报》“文革”中停刊尚未恢复出版。各版不同时期的出版情况、报社人员的变动、版面的调整、报纸的发行等情况本书均有记载。

在编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报纸不易找全。为此，谢国明、孔晓宁、沈兴耕、陶世安四位同志克服了不少困难，将报纸找齐并详细逐日阅读、摘录。另有刘诚、郭敏、韩玉灵、张颖、石英等五位同志为资料的搜集、整理、抄录、核实及其他工作花了很多心血。由于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本书才得以完成并出版。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史料应存真、求实。本此精神，我们以客观、认真态度予以摘录，存其要点，按年、月、日编排。由于水平所限，如有不妥之处，尚祈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1926年	(1)
1927年	(9)
1928年	(36)
1929年	(69)
1930年	(98)
1931年	(122)
1932年	(146)
1933年	(172)
1934年	(194)
1935年	(211)
1936年	(249)
1937年	(276)
1938年	(308)
1939年	(342)
1940年	(366)
1941年	(405)
1942年	(441)
1943年	(480)
1944年	(508)
1945年	(541)

1946年.....	(587)
1947年.....	(628)
1948年.....	(659)
1949年.....	(693)

1926年

9月1日，新记《大公报》在天津日租界旭街复刊。报名改用隶书，为工厂刻字工崔永超所写。以后，《大公报》各版均一律沿用，成为标准招牌字。

每日出版对开两大张，共八版。版面安排为：

一版：报头，旁为言论版，下半版广告。

二版：国内要闻，电讯、通讯。

三版：国外要闻。

四版：经济与商情，下为广告。

五版：广告。

六版：地方通讯。

七版：本埠新闻，下为广告。

八版：副刊《艺林》，下为广告。

以后，第四版以下各版内容有变更，如副刊改为《小公园》；增加周刊；本埠新闻改出两个半版等。

创刊之时，免费赠送两天。日发行量不及2000份。每日派人往戏院抄戏目，免费刊登节目广告。后按月收少数款项。广告每月收入仅200余元。至12月底，日发行量由2000份增到3198份。

9月1日

一版：刊出《本报启事》、《大公报续刊辞》、《本社同

人之志趣》。下半版为广告。

《本报启事》：

“一、本报完全公开，作人民真正喉舌，谨愿一部分纸面，公诸大众。海内硕彦，各界名人，如有长篇论著，持论平允公正，经敝报认为有刊登价值者，当为辟《时论》一栏，在最优地位发表。至于对时事社会，偶有所感，发抒成文，而体裁简短者，则汇入《读者之声》栏内，以饷读者。

“二、本报宗旨，注重民生问题，商业经济，尤所注意。因辟《经济与商情》一栏，举凡国内国外，本市外市，金银市价，内外汇兑，以及棉纺、五金、豆米粮食之商情涨落，市况高低，均派有专员随时以专电报告，或用专篇记述，编列既极醒目，消息尤求敏确，务使商界得莫大之便利。”

《大公报续刊辞》全文119字如下：

“韩非子曰：‘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已知之矣。’本报以大公名者已二十五年，立言之道，勿待申说。时迁事异，责在今人。今当续刊之始，重申顾名之戒，特表韩非子之言，冠于篇首。今后社会所以相背者若何，莫可前知。吾人所以自环者若何，当期先免而已。”

《本社同人之志趣》（署名：记者。张季鸾笔名）宣布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第一不党 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

二版：专电，“两湖战争牵动东南”，全面报道北伐军胜利前进，吴佩孚节节败退，孙传芳、张作霖磨拳擦掌，跃跃欲试，驻华外交使团等动态。配刊孙传芳、吴佩孚照片各一张。

9月2日

一版：论评，《战卜》（署名：前溪。吴鼎昌笔名）称：“近年以来，战事缠绵如故，而人心向背不明。袒刘袒吕，左右皆非；兴楚兴汉，端倪未见。”

二版：专电，“武汉形势剧变”，北伐军进至距武昌三十里处，孙传芳即将出动。

9月4日

一版：论评，《回头是岸》（署名：榆民。张季鸾笔名）称：“国民党之标明‘以党治国’，及国际共产党之入党，与夫亲俄色彩之浓，宣传工潮学潮之烈，此皆吾人所反对者。”

9月5日

一版：论评，《注意国内与国际之变化》（署名：前溪）担忧“连年以来各国操纵内争之黑幕，或将成事实之公开。假赤化之内争，或竟变为真赤化之外战，皆在吾人忧虑之中。”

9月8日

一版：社评（论评自今日起改称社评），《武汉陷落与孙蒋开战》（署名：记者）称：南军“由粤入湘，期月之间，实现会师武汉之理想，此固十五年来一大快事，亦是证明新旧势力搏击，旧势力渐入天然淘汰之境。尔后问题，不在旧势力之如何铲除，而在新势力之如何大成。”

9月9日

一版：社评，《望英人猛省》（署名：记者）反对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广东上岸捕人和英舰在武汉炮击北伐军，认为“前者为干涉内政，后者为侵犯主权”，结果是“为丛驱雀，援助赤俄也”。

9月10日

二版：专电，“孙传芳宣布讨蒋”。

9月12日

一版：社评，《警告南北军人》（署名：诚）就英舰炮击万县一事称：“凡执兵权负责任者，无论如何，必须忍耐持重，勿贻外人以干涉之口实，虽有时负辱含羞，应万勿仓卒愆事。”社评，《注意两大潜势力之爆发》（署名：前溪）指中原地区的红枪会为生计革命的势力，革命党为思想革命的势力，担忧此两大革命专事破坏而致亡国。

9月23日

一版：社评，《军阀与党阀》认为军阀党阀均“漠视舆论而排斥异己，则为祸流毒，初无二致，纵可钳制于一时，势必土崩于一旦”。

10月3日

一版：社评，《孙蒋战来前途之推测》（署名：天马）就孙传芳军事得利赞孙“为人规模不大，而头脑颇明晰有决断……

较寻常武人，得地盘而失人心者，究胜一筹”。

10月4日

一版：社评，《说爱》（署名：记者）责孙传芳口头宣言爱国、爱民、爱敌，实则滥杀学生。

10月12日

一版：社评，《关税自主之先声》（署名：市隐）了解广东政府加征新税之具体办法后，“乃认广州此举，实关税自主之先声”。前此，“吾人深疑与外人妥协，为让步交换之条件，故本报曾表示反对意见”，今“吾人自应取消意见，表示赞成之意”。

10月17日

二版：专电，“浙省自治”。

10月19日

一版：社评，《论自治运动》（署名：记者）认为浙江夏超的独立属联省自治派，而自治派为“带民主主义色彩，注重代表中流阶级之利益者”，望反对一党专政、反俄，主张宪政者，不可敌视之。

10月21日

发起“废除不平等条约宣传周”。一版大半版刊出社评《不平等条约能否废除，视此一周间民众之努力如何》。社评要求中比商约应于本月二十七日起失效。此后，直到11月6日外交部宣布中比商约失效为止，共发表社评14篇，猛烈抨击。

10月22日

一版：社评，《浙人治浙》（署名：前溪）反对夏超所标榜的“浙人治浙”，认为是“在世界思想发达之时，急剧开倒车转入部落思想主张”。

10月23日

二版：专电，“浙沪自前日接触”，夏超失败出走。浙江重入孙传芳之手。

11月2日

一版：社评，《社会上最大危机》（署名：前溪）认为青年学生毕业后无路可走，无工作可做，乃“社会上最大危机”，故“解决生计问题先于思想问题”。

刊登《本报启事》——“征求学生出路办法”，认为“学生出路为现今社会上最大问题，凡社会上有良好办法见示者，本报极愿介绍于社会有识者以资研究”。

11月3日

六版：通讯报道，驻郑州军队强行以毫无信用之军用钞票向商家换铜元，题为“无边军钞萧萧下，不尽铜元滚滚来”。

11月6日

一版：《本报启事》——凡一次订阅本报六个月以上者，在期内每星期赠送《国闻周报》①一份，以二千份为限。

11月7日

自今日起，社评不再署名，以示社评代表社方意见，不代表作者本人。

11月10日

一版：社评，《论北方政局》劝张作霖自为元首，称：“京津一带，今全在奉军势力之下，大江以北，最大之军事团体，莫如奉系，兵多械精，足霸一时。果欲挟武力平中原，张应自负其责；反之即欲政治解决，亦宜挺身而出，以政策与全国相见，故张之登台，在北方今日，毋宁为最合理也。”况“共和国家人人可以作元首，第视政治能力如何耳”。

① 《国闻周报》为《大公报》附属报。

11月11日

二版：消息，“奉张昨夜一时到津”。

11月15日

二版：消息，“奉鲁高级将领在天津蔡家花园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积极出兵”。

11月20日

二版：消息，“孙传芳北上到津请援，鲁军即日大举出兵”。

11月29日

二版：消息，“顾维钧等内阁全体阁员通电辞职”。

11月30日

一版：社评，《话说天下大势》认为当今中国大势是必将乱，主张南北各方“各以其现在武力所能保持之范围内，各施其政，互不侵扰”。

12月2日

一版：社评，《武汉工潮与外国》就外电攻击武汉工人运动为仇外暴行指出，“武汉工潮勃发之后，本报曾为文批判之，并深致忧虑之意。虽然，此仅为程度方法时机次序之问题”，而外人攻击为“性质”问题，即根本无视中国工人之“人格”，“依然只视为货品或机械”之“苦力”。故“吾人一面望中国热心劳工运动者，取慎重步骤，顾经济情形，勿使社会陷于恐慌。然一面对于一部分外人卑视华工，妄言仇外，则不得不诉诸世界各资本国之公论与良心，且望我不甘劣等之全国人士，认定原因，主持清议，勿为彼等自命‘优越’者之宣传所误也。”

二版：消息，“张作霖一日在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职，孙传芳、张宗昌副之”。

12月4日